

彭莹莹, 邱耀敏. 京津冀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影响因素[J]. 江苏农业科学, 2019, 47(4): 316–320.
doi:10.15889/j.issn.1002-1302.2019.04.071

京津冀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影响因素

彭莹莹, 邱耀敏

(北京联合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所, 北京 100023)

摘要:基于京津冀地区 257 份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调查数据,从人口学特征、家庭、创业者能力素质、创业环境等方面选取 20 个变量,运用多分类有序逻辑(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分析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行为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从人口学特征和家庭因素来看,大龄、男性、北京户籍、已婚、目前无孩子的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概率较大;从能力素质和创业环境因素来看,创业者的管理和学习能力、创业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具有正向影响,创业服务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具有负向影响。研究结论既丰富了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影响因素的研究,也为京津冀地区制定针对性扶持政策、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了依据。

关键词:京津冀地区;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F323.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1302(2019)04-0316-05

2014 年 3 月,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其核心是疏解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社会热潮的背景下,农民工返乡创业作为推动京津冀地区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协同发展的重要举措,也得到了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大力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不仅可以缓解城市的就业压力,还能够拉动农村经济的再增长,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实现农民的自我价值。

农民工返乡创业是涉及到诸多研究领域的复杂过程,不同学者对此问题研究的切入点和视角也有所不同,但普遍认为,创业行为是受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综合行为过程。梳理已有的文献发现,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集中在以下方面:(1)个人因素,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人口学特征因素,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和学历等。其中,年龄与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呈现倒“U”形关系^[1-2],但是对拐点的界定有较大差异,从 30 岁至 55 岁不等。另一类是非人口学特征因素,主要包括自我效能、教育经历、创业能力、务工经历、技能水平、社会网络等^[3-4]。段锦云等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一般自我效能感对其创业效能感和创业意向都有正向影响^[5]。(2)农民工家庭因素。针对该因素的讨论相对较少,主要包括家庭经济状况、家庭人口状况、家庭创业经验和地理条件等方面^[6]。已有研究普遍认为,家庭经济状况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决策的影响是最主要的^[7-8]。徐超等研究表

明,家庭抚养负担与创业行为呈正相关关系^[9]。(3)环境因素。由于创业环境涉及因素较多,众学者并没有达成一致认识,目前应用比较广泛的是全球创业观察(GEM)提出的从金融支持、政府政策、政府项目支持、教育与培训、研究开发转移、商业和专业基础设施、进入壁垒、有型基础设施、文化和社会规范等 9 个方面评价创业环境。张秀娥等认为,金融支持、创业政策、创业市场环境、基础设施条件等与农民工返乡创业呈显著正相关关系^[10];吴磊等重点提出,市场环境和政府环境对农民工回乡创业选择的影响显著^[11];张秀娥等研究结果表明,家乡人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态度、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能力与外部资源可获得性的担忧等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创业行为^[12]。

创业行为是一个受多方面影响的复杂范畴,现有研究成果呈现了一个较为全面的影响因素体系。但鉴于返乡创业行为的复杂性,还需要加强以下 2 方面的研究:(1)有些因素在以往的研究中并未深入下去,有必要在总结创业行为规律的基础上继续挖掘影响现实创业情境与行为的因素,比如家庭因素,由于创业与家庭之间具有天然关系^[13],是既可以完成家庭中照顾老人、孩子的责任和义务,又可以增加工作时间的自然选择^[14],而且在现实中,经常有农民工由于家庭突发事件决定返乡创业,因此家庭因素值得进行深入研究;对于自我效能来说,现有研究侧重自我效能对创业意愿的影响,但关于其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的影响讨论不足;就创业环境因素而言,多数研究者侧重于从政策环境、经济环境、基础设施条件等方面开展分析,而对人文环境因素考虑不足。(2)在研究方法上,多数文献都是用二分法将创业行为分为未创业和创业 2 种状态,并借助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影响创业行为的主要因素,但是创业行为不仅只有绝对的创业和未创业,采用二分法容易丢失重要信息,考虑到在创业与未创业之间还有一种准备创业的中间状态,因此将准备创业纳入研究范畴可以更全面地对创业行为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重大国家战略,自 2014 年提出以来,有力地推动了京津冀 3 地自然资源、资本资源、信息资源

收稿日期:2018-11-2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编号:15BJY029);北京学研究基地开放课题(编号:sk30201604);北京市教育委员会项目(编号:SM201711417001);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编号:13JGB048);北京联合大学人才强校百杰计划(编号:BPHR2017CS08)。

作者简介:彭莹莹(1978—),女,安徽合肥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源开发、创业就业管理。Tel:(010)52072398;E-mail:shtyingying@buu.edu.cn。

通信作者:邱耀敏,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源开发。
E-mail:dym168@sohu.com。

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合理配置。经过多年发展,京津冀 3 地在经济增长、交通运输、环境保护等方面密切合作,互利共赢,为 3 地的返乡农民工创新创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一方面,各类资源在区域间的快速流动,尤其是供给侧改革的推进,催生出众多新生经济增长点,直接刺激了农民工的返乡创业行为;另一方面,区域发展不平衡仍然存在,因此可以利用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机会将北京地区的创新创业资源和成果扩散到天津、河北地区,促进京津冀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形成,对于释放新动力、促进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5]。因此,研究京津冀 3 地农民工返乡创业对于促进创新创业与区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且提出的地方政策支持建议也可供其他地区参考与借鉴。基于此研究目的,本研究拟通过研究京津冀 3 地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采用有序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结果分析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主要因素,探索引发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重要条件,并借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改善京津冀 3 地创业环境,有效扶持和引导农民工返乡创业,提高农民工返乡创业绩效。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变量选取及说明

基于研究目的,本研究以返乡创业行为为输出变量,选择未创业的赋值为 1,选择准备创业的赋值为 2,选择创业的赋值为 3。自变量则主要从创业者人口学特征、家庭、创业者能力素质、创业环境等方面进行挖掘。第 1 类是人口学特征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学历层次、户籍、婚姻状况等,主要衡量不同性别、学历层次、户籍、出生年代、婚姻状况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返乡创业行为上是否存在差异。其中,性别变量分为男性和女性,分别赋值为 1 和 2;年龄变量是连续变量;学历变量分为初中及以下、高中(含职高专技校)、大专及以上 3 个层次,分别赋值为 1、2、3;户籍变量分为北京、天津、河北,分别赋值为 1、2、3;婚姻变量分为未婚、已婚 2 种情况,分别赋值为 1、2。第 2 类变量是家庭变量。考虑到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现实情况,家庭变量主要包括父母年龄、父母健康状况、子女就学地和家庭年收入等,主要衡量不同家庭状况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返乡创业行为上是否存在差异。其中,父母平均年龄变量分为 50 岁及以下、51~70 岁、70 岁以上 3 种情况,分别赋值为 1、2、3;父母健康状况变量分为均健康和不好 2 种情况,分别赋值为 1 和 2;孩子就学地分为目前无孩子、户籍所在地、非户籍所在地、孩子未上学 4 种情况,分别赋值为 1、2、3、4;家庭年收入变量分为年收入 10 万元以下、10~20 万元(不含 20 万元)、20 万元及以上,分别赋值为 1、2、3。第 3 类是能力素质变量,主要包括自我效能感、创业能力和社会资本等。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人对自己完成某方面工作能力的主观评估,它会对创业者的创业行为产生重要影响。自我效能感主要借鉴现有的成熟量表进行评估,并结合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进行了修正,主要从主动寻求变化、体验新鲜事物、坚持目标、处理问题的信心等方面进行衡量,并采用李克特 5 级量表进行评价,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对应数字 1 到 5。创业能力作为一个综合变量,涉及机会能力、关系能力、概念能力、组织能力、战略能力、承诺能力和支持能力等多项能力^[16],但受返乡农民工自身及其所处创业规模、层次和阶段

的影响,重点发挥作用的创业能力主要是资源获取能力、运营管理能力、关系能力和学习能力,同样采用李克特 5 级量表进行评价。此外,对于外出务工的农民工而言,经常联系的老家朋友会给予其及时传递很多关于家乡变化以及创业的相关信息,从而影响其返乡创业行为,因此本研究引入了社会资本变量,并用家乡地经常联系的朋友数量进行衡量,分为 3 人及以下、4~6 人、7 人及以上 3 种情况,分别赋值为 1、2、3。第 4 类是环境变量。已有研究表明,创业环境与创业活跃度呈很强的正相关关系^[3]。GEM 模型提供了相对成熟的创业环境分析框架,因此本研究借鉴 GEM 模型,参考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现实情境,从经济环境、市场环境、金融支持、创业政策、税收政策、创业培训、创业指导和文化氛围等方面进行分析。环境变量主要分为不同意和同意 2 种情况,分别赋值为 1 和 2。

1.2 研究方法

由于创业行为被分为未创业、准备创业和创业 3 种状态,因此本研究将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应用于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因素的发生概率越大,其作用程度越大,从而探究各影响因素的重要性。

记创业状态 Y 有 m 个取值,并且设定 $Y=3$ 为参照组,自变量 $X=(X_1, X_2, X_3, \dots, X_p)$, 则 Y 的条件概率为

$$P(Y=k | x) = \frac{\exp(Y_k)}{1 + \sum_{i=1}^m \exp(Y_i)} \quad (1)$$

式中: $k=0, 1, 2, \dots, m-1$ 。相应的 Logistic 回归模型为

$$Y_k = \ln \left[\frac{P(Y=k|x)}{P(Y=0|x)} \right] = \beta_{0k} + \beta_{1k}X_1 + \beta_{2k}X_2 + \dots + \beta_{pk}X_p \quad (2)$$

$k=0$ 时, $Y_0=0$ 。 β 系数是 Logistic 回归方程诊断出的关系系数,表示解释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

1.3 样本基本情况

本研究内容涉及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的因素差异,主要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在京津冀地区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 257 份,收回有效问卷 251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达 97.7%。其中返乡创业占 20.7%,准备返乡创业占 14.7%,返乡创业占 64.6%;男性占 57.3%,女性占 42.7%;北京户口占 28.4%,天津户口占 35.8%,河北户口占 35.8%;平均年龄为 29 岁,年龄最大为 38 岁,年龄最小为 20 岁;初中及以下学历占 13.6%,高中(含职高专技校)学历占 48.6%,大专及以上学历占 37.8%;未婚占 45.7%,已婚占 54.3%;父母平均年龄是 50 岁及以下占 20.3%,51~70 岁占 79.7%;父母均身体健康占 94.8%,父母身体不好占 5.2%;目前无孩子占 52.6%,孩子在户籍所在地就学占 37.5%,孩子非户籍所在地就学占 3.0%,孩子目前未上学占 6.9%;家庭年收入为 10 万元以下占 62.9%,家庭年收入为 10 万~20 万元(不含 20 万元)占 30.6%,家庭年收入为 20 万元及以上占 6.5%;老家朋友为 3 人及以下占 13.4%,老家朋友为 4~6 人占 46.6%,老家朋友为 7 人及以上占 40.0%。

2 京津冀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行为影响因素实证分析结果

2.1 信度和效度检验

信度分析是对测量结果一致性和稳定性进行评估的指标。本研究采用 α 信度系数法进行信度分析。经过信度检

验,问卷整体和各变量的信度均大于 0.7,可信度较好。由于涉及的创业能力变量较多,且众多变量之间极有可能存在相关性,因此首先采取降维途径,通过提取公共因子将相关性高的变量进行归类,以提高后续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估计结果的可靠性。创业能力变量的 KMO (Kaiser – Meyer – Olkin) 值为 0.906, Bartlett 球形检验统计量在 1% 水平上显著,各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适合作因子分析,分析结果见表

表 1 创业能力因子分析结果

创业能力变量及测量题目	因子 1	因子 2	因子 3
我能发现工作、生活中可能存在的市场机会	0.648		
我在打工过程中学到了技能或积累了丰富的中高层管理经验	0.609		
我善于整合资源去完成一项任务或活动	0.709		
我与亲戚朋友具有较紧密的联系	0.600		
我善于在实践中学习各种知识和技能	0.706		
我喜欢用创新的方法处理所面临的一些问题	0.686		
我能够通过多种渠道收集商业信息		0.560	
我能够获得创业所需的启动资金(自有或融资均可)		0.678	
我一旦创业,技术提供是没有问题的		0.635	
我能够获得开发和经营企业所需要的人才		0.796	
我与政府部门具有较紧密的联系		0.718	
我与客户和供应商具有较紧密的联系			0.897

2.2 京津冀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影响因素的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结果

为分析影响京津冀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的主要因素,本研究借助软件 SPSS 21.0 进行有序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通过诊断发现,所有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 10,表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模型拟合信息显示,模型通过卡方检验, $P < 0.01$,说明至少有一个变量系数不为 0,具有统计学意义,模型拟合效果较好(表 2)。平行性检验显示, $P = 0.385$,说明平行性假设成立,可以使用有序 Logistic 过程进行分析(表 3)。最终的有序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结果见表 4。Wald 卡方检验结果表明,各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

表 2 模型拟合信息

模型	-2 对数似然值	卡方	自由度	P 值
仅截距	412.668			
最终	319.509	93.158	29	<0.01

表 3 平行性假设检验

模型	-2 对数似然值	卡方	自由度	P 值
零假设	319.509			
广义	288.911 ^a	30.599 ^b	29	0.385

注:a 表示在达到最大步骤对分次数后,无法进一步增加对数似然值;b 表示卡方统计量的计算基于广义模型最后 1 次迭代得到的对数似然值。

2.2.1 从人口学特征变量来看,年龄、性别和婚姻状况都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有显著影响。由表 4 可知,年龄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具有正向影响,这意味着年龄越大,农民工选择返乡创业的概率越大,主要是因为随着农民工年龄的增加,其在城市务工过程中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阅历、创业资金,同时在城市中的竞争力逐渐降低,而且融入城市存在困难,所以选择返乡创业的概率更大。此外,由于调查对象的最大年龄仅为 38 岁,尚未表现出年龄与创业概率呈“U”形关系

1。其中,因子 1 主要包括了管理能力和学习能力的大部分题项,将其命名为管理和学习能力;因子 2 主要包括了资源获取能力的大部分题项,将其命名为资源获取能力;关系能力的部分题项由于因子载荷系数低于 0.5 被删减,部分题目归入管理和学习能力或资源获取能力,但与客户和供应商具有较紧密的联系这一题项独立成为因子 3,可以将其命名为市场能力。

的现象。男性相比女性返乡创业的概率更大,主要与男性更高的风险偏好和更广的人际联系有关^[17]。已婚者由于拥有更稳定的发展环境,且夫妻双方能够发挥各自优势获得更多的创业资源,因此返乡创业的概率更大。就户籍变量而言,北京户籍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即相比河北籍的农民工而言,北京籍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概率更大,这主要可能与北京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学历较高、人脉较广以及创业环境较好有一定关系。

2.2.2 从家庭变量来看,家庭年收入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显著。由表 4 可知,家庭年收入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表现为负向影响,这意味着家庭年收入低于 10 万元的农民工相比家庭年收入在 20 万元及以上的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概率更大,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家庭年收入在 20 万元及以上的农民工由于对现有的经济条件相对满意,反而不愿意承担创业风险,而家庭年收入低于 10 万元的农民工则更希望通过创业能改善其生活条件。从孩子就学地来看,相比目前孩子未上学,目前无孩子的农民工返乡创业概率更大,可能与其家庭负担较小、不用照顾未满学龄儿童有很大关系,因此返乡创业的概率更大;而孩子是在户籍所在地或非户籍所在地就学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并无显著影响,但是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受孩子在非户籍所在地就学的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概率会更低一些,这也与现实情况相一致。

2.2.3 从能力素质变量来看,管理和学习能力对农民工的返乡创业有显著影响。管理和学习能力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具有正向影响,这意味着农民工的管理和学习能力越强,其返乡创业的概率也越大。创业者的管理能力可以直接用于管理企业经营所需的资源,提高资源的运作效率,而学习能力则意味着他们可以向成功创业者或者自身过去的经验教育开展创业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创业能力,以适应企业未来发展的需要。从统计结果来看,自我效能、资源获取能力和市场能力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均无显著影响。究其原因,结合已有研究来看,自

表 4 京津冀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影响因素的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结果

变量	估计	标准误	Wald 值	自由度	P 值	95%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创业行为 = 1	-12.375	2.839	18.995	1	0	-17.940	-6.810
创业行为 = 2	-11.322	2.853	15.743	1	0	-16.915	-5.729
年龄	0.171	0.060	8.189	1	0.004	0.054	0.288
自我效能	-0.822	0.436	3.557	1	0.059	-1.676	0.032
管理和学习能力	1.454	0.466	9.722	1	0.002	0.540	2.368
资源获取能力	-0.017	0.283	0.004	1	0.951	-0.572	0.537
市场能力	-0.001	0.021	0.003	1	0.958	-0.043	0.041
学历 = 1	-0.280	0.591	0.225	1	0.636	-1.44	0.879
学历 = 2	-0.411	0.421	0.954	1	0.329	-1.237	0.414
性别 = 1	0.732	0.368	3.959	1	0.047	0.011	1.454
户籍 = 1	1.835	0.519	12.505	1	0	0.818	2.852
户籍 = 2	-0.303	0.412	0.540	1	0.462	-1.111	0.505
婚姻 = 1	-1.435	0.819	3.071	1	0.080	-3.039	0.170
父母年龄 = 1	0.673	0.490	1.885	1	0.170	-0.288	1.634
父母身体 = 1	0.275	1.001	0.075	1	0.784	-1.687	2.237
孩子就学地 = 1	2.045	1.032	3.928	1	0.047	0.023	4.067
孩子就学地 = 2	-0.062	0.726	0.007	1	0.932	-1.485	1.361
孩子就学地 = 3	-0.916	1.093	0.702	1	0.402	-3.058	1.226
家庭年收入 = 1	-19.812	0.425	2 175.725	1	0	-20.644	-18.979
家庭年收入 = 2	-18.549	0	—	1	—	-18.549	-18.549
老家朋友 = 1	0.257	0.546	0.221	1	0.638	-0.814	1.327
老家朋友 = 2	0.510	0.399	1.633	1	0.201	-0.272	1.291
经济发展 = 1	-0.128	0.734	0.030	1	0.862	-1.567	1.312
基础设施 = 1	-0.561	0.799	0.493	1	0.483	-2.127	1.005
市场环境 = 1	1.287	1.031	1.558	1	0.212	-0.734	3.307
创业政策 = 1	-0.365	0.603	0.366	1	0.545	-1.547	0.818
金融支持 = 1	-0.439	0.557	0.623	1	0.430	-1.530	0.652
税收优惠 = 1	0.018	0.373	0.002	1	0.961	-0.714	0.750
创业培训 = 1	1.105	0.507	4.755	1	0.029	0.112	2.099
创业服务 = 1	-1.301	0.530	6.018	1	0.014	-2.341	-0.262
文化氛围 = 1	-0.858	0.518	2.745	1	0.098	-1.873	0.157

注:每个类别变量最后 1 组为对照组,因表格过长故做了删减处理。

我效能更多地是影响农民工的返乡创业意愿,对真正的创业行为影响并不显著;同时,受农民工自身能力和社会资本的制约,其资源获取能力和市场能力也相对较弱,因此对其创业行为并无太大影响。

2.2.4 从创业环境变量来看,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有显著影响 由表 4 可知,创业培训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呈正向影响,这意味着当地政府提供的创业培训力度越大,针对性越强,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概率越大。值得注意的是,创业服务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呈负向影响,这与已有研究结论不一致。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已经创业的农民工因为对于创业服务的要求更高,所以对政府提供的创业服务满意度较低,而未发生创业行为的农民工可能对创业服务并不关心。此外,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市场环境、金融支持、创业政策、税收优惠、文化氛围等变量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的影响不显著。就经济发展速度来看,近年来河北、天津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环境整治带来的阵痛,使得京津冀在全国经济版图中的占比下降,3 地经济发展速度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部分影响了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积极性。基础设施对于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作用关键在于能够为其提供必备的交通、信息渠道和

市场销路,然而虽然京津冀这几年的基础设施投入较大,建设相对完善,但也没有对这 3 地的农民工返乡创业产生显著影响。另外,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农民工创业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为本地提供产品和服务,而是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开展销售活动,因此本地的市场环境没有对农民工返乡创业产生重要影响。而金融支持、创业政策和税收优惠之所以表现不显著,可能是在这些方面政府出台的政策支持力度不够,或者创业者对这些政策了解不足,使其没有充分发挥出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促进作用。而文化作为一项非正式制度,对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倾向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积极活跃的创业氛围可以对创业孵化和起步产生重要影响^[17],但从本研究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文化氛围对于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还是与大多数农民工的思想比较保守,无力承担创业失败的风险,因此周边创业成功典型较少、创业氛围不够浓厚有一定关系。

3 结论与政策启示

3.1 主要结论

多分类有序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显著影响京津冀

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因素有 7 个,分别是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家庭年收入、管理和学习能力、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其中,从人口学特征和家庭因素来看,大龄、男性、北京户籍、已婚、目前无孩子的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概率较大,而从能力素质和创业环境因素来看,创业者的管理和学习能力、创业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具有正向影响,创业服务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负向影响。

3.2 政策启示

加强创业培训,提升返乡创业农民工的创业能力。在开展创业培训时,应充分依托京津冀地区科研院所集中、教育资源丰富的优势,积极为返乡创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开展针对性培训,提高他们的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尤其是管理和学习能力,为企业的后续发展提供有利支撑。应注重创业前期、创业初期、创业后不同阶段的能力培训,如创业前期的基本创业流程、市场经营、财税、人力资源管理等基本知识,创业后的市场风险防控、融资、营销、品牌策略等知识,使创业培训贯穿到创业过程的始终。创业培训中还应特别强调对创业经验的积累和传承,通过对成功和失败创业者经验教训的总结,使受培训者能够获得有益的启示和帮助。在这个过程中还应注意调动农民工参与培训的积极性,并注重转变培训的方式,使培训的内容与形式真正适应返乡农民工的创业需求。

提高创业服务的针对性,打造一站式服务平台。京津冀地区可充分利用地缘优势,协同建立综合公共服务平台,为区域内农民工返乡创业开设绿色通道,简化工商注册手续,为其构建高效服务体系;搭建便捷高效的创业信息服务平台,为返乡创业者提供及时有效的信息资源,通过信息平台进行开业指导、创业孵化、项目推介、咨询指导、创业融资相结合的创业服务,拓宽信息获取和发布渠道,营造良好的创业氛围。

尽管在本研究中,返乡农民工创业影响因素中的创业政策、税收优惠、金融支持、文化氛围等变量并没有被证实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但其他一些研究已经证实了它们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这反映出目前京津冀 3 地政府及相关部门在这些方面针对提升与促进返乡农民工创业活动的不足。这一方面要求政府进一步针对返乡农民工制定出台相应的扶持政策,如依据税收公平原则,为返乡创业农民工实施税收优惠,根据不同行业和不同的创业阶段制定相对应的税收减免期限,引导和扶助更多的农民工返乡创业;鼓励和支持各类社会资本以多种方式创业者提供资金支持,允许创业者利用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融资,解决创业融资难的问题。另一方面,政府要充分利用各类宣传媒介和公共服务平台,加强政策宣传与解读力度,并充分发挥产业联盟和行业协会的作用,提高政策的社会知晓率和群众积极性,使政策与服务惠及更多有创业意愿的返乡农民工。此外,在鼓励和扶持返乡农民工创业时,应该加强对创业的宣传,政府应该通过各种渠道来宣传创业成功的典型,促使社会形成一种积极的、自主的、独立的、创新的文化,强调通过个人努力来获得成功,并使人们正确看待创业失败的问题,避免返乡农民工因担心创业失败被人嘲笑而影响其创业的积极性^[10]。当整体区

域的创业氛围浓厚,不断接受到他人成功创业的信息,返乡创业成为一种潮流时^[18],农民工更可能采取从众行为,展现示范性规范对行为意愿的增强作用^[19]。

参考文献:

- [1] 刘俊威,刘纯彬. 农民工创业性回流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安徽省庐江县调研数据[J]. 经济体制改革,2009(6):85-89.
- [2] 汪三贵,刘湘琳,史识洁,等. 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影响[J]. 农业技术经济,2010(12):4-10.
- [3] 刘唐宇. 农民工回乡创业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西赣州地区的调查[J]. 农业经济问题,2010(9):81-88,112.
- [4] 芮正云,庄晋财. 机会创新性能提高农民工自主创业的成功率吗[J]. 财经科学,2015(10):92-101.
- [5] 段锦云,徐悦,田晓明. 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效能与创业意向:社会榜样和主观规范的影响[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111-119.
- [6] 汪昕宇,陈雄鹰,邹建刚,等. 我国农民工返乡创业影响因素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16(3):86-99.
- [7] 程广帅,谭宇. 返乡农民工创业决策影响因素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23(1):119-125.
- [8] 李玫. 影响民族地区返乡女性农民工创业因素分析——基于微观、中观、宏观视角[J]. 贵州社会科学,2012(2):88-90.
- [9] 徐超,吴玲萍,孙文平. 外出务工经历、社会资本与返乡农民工创业——来自 CHIPS 数据的证据[J]. 财经研究,2017,43(12):30-44.
- [10] 张秀娥,孙明海,刘洋. 农民工返乡创业影响因素与创业活动的关系[J]. 经济纵横,2011(9):89-91,95.
- [11] 吴磊,郑风田. 社区农产品销售市场的分析与评价——以开封市东郊菜市场为例[J]. 中国物价,2012(7):52-54.
- [12] 张秀娥,孙中博,韦韬. 新生代农民工工作不安全感对离职倾向的影响——基于 396 个新生代农民工的调研分析[J]. 中国农村研究,2013(11):199-212.
- [13] 韩俊. 中国农民工战略问题研究[M].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9.
- [14] 陈文超,陈雯,江立华. 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人口科学,2014(2):96-105.
- [15] 张贵,李涛,原慧华. 京津冀协同发展视阈下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构建研究[J]. 经济与管理,2017,31(6):5-11.
- [16] Man T W Y, Lau T, Chan K F. The competitiveness of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A conceptualization with focus on entrepreneurial competencies[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02,17(2):123-142.
- [17] 孔祥利,陈新旺. 资源禀赋差异如何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基于 CHIP2013 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 产经评论,2018(5):112-120.
- [18] 曹玲玲,秦小丽,吴宪霞. 提升“淘宝村”集群效应的影响因素分析[J]. 江苏农业科学,2017,45(12):311-315.
- [19] 李泓波,邓淑红.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影响因素研究[J]. 湖北农业科学,2018,57(19):121-124.